



二十世纪 《俗文學》周刊总目

◎ 关家铮 编著

齊魯書社

二十世紀

(俗文學) 周刊總目

卷一 第一至五期

第一卷

二十世纪

《俗文學》周刊总目

◎ 关家铮 编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俗文学》周刊总目/关家铮编著.
济南:齐鲁书社,2007.1
ISBN 7-5333-1780-7

I. 二... II. 关... III. 通俗文学—文学研究—期刊
目录—中国—20 世纪 IV. Z88: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0915 号

二十世纪《俗文学》周刊总目

关家铮 编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12.375
插 页 4
字 数 276 千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33-1780-7/I·333
定 价 25.00 元

——再介紹一部反漢奸的小說——

[illegible]

漢奸列傳

[illegible]

(二) 張三

六 四 五

報日西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四日

俗學

院本與雜劇的分別

醉翁談錄：舌耕劄記

品類

香港

商標印書院

俗文學

編主深景道
期一第
版四第

沈默傳奇精選

——雜記

沈默傳奇，是沈默先生所著的一部小說，內容豐富，情節動人。這部作品不僅具有文學價值，更是一部反映社會現實的佳作。沈默先生以其敏銳的觀察力和深刻的筆觸，描繪了當時社會的種種醜態和人性的扭曲。這部小說在當時文壇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成為沈默先生創作生涯中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關於鍾花錦三則
鍾花錦，是沈默先生筆下的一個重要人物。她的故事充滿了傳奇色彩，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種種矛盾和衝突。通過對鍾花錦命運的描寫，沈默先生深刻地揭露了社會的黑暗和人性的扭曲。這三則故事不僅情節引人入勝，更在藝術表現上具有極高的成就，是沈默先生創作風格的集中體現。

上海《神州日報·俗文學》

元離劇後期作者
傳略
元離，原名元離，字子離，江蘇人。早年從事文學創作，後因生活所迫，轉行他業。其作品風格獨特，深受讀者喜愛。元離在文學創作上的成就，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財富。他的創作經歷和作品，不僅是研究當時文學的重要參考，也是了解社會現實的窗口。

通俗文學

(期四十四第)
欣出一期星逢每

上海《大晚報·通俗文學》



第五十期 每張五分

（一）這是一篇關於俗文學的評論文章，作者為胡適。文章開頭提到「俗文學」這個名詞，並指出其在學術界和社會上的地位。作者認為，俗文學並非低級的文學，而是具有其獨特價值和生命力的文學形式。他追溯了俗文學的源頭，指出其與民間生活、民間藝術的緊密聯繫。文章進一步論述了俗文學在反映社會現實、傳承文化傳統方面的作用。作者呼籲社會各界正視俗文學的地位，給予其應有的尊重和支持。文章結尾強調，俗文學的研究不應僅限於學術圈，而應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以促進文學的多元發展和文化的繁榮昌盛。

（二）這是一篇關於俗文學的評論文章，作者為胡適。文章開頭提到「俗文學」這個名詞，並指出其在學術界和社會上的地位。作者認為，俗文學並非低級的文學，而是具有其獨特價值和生命力的文學形式。他追溯了俗文學的源頭，指出其與民間生活、民間藝術的緊密聯繫。文章進一步論述了俗文學在反映社會現實、傳承文化傳統方面的作用。作者呼籲社會各界正視俗文學的地位，給予其應有的尊重和支持。文章結尾強調，俗文學的研究不應僅限於學術圈，而應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以促進文學的多元發展和文化的繁榮昌盛。

俗文學 胡適題

第一期 每冊五分

這是一本關於俗文學的專著，由胡適先生題詞。書籍內容豐富，涵蓋了俗文學的定義、分類、發展歷程以及其在社會文化中的地位。胡適先生在題詞中強調了俗文學的重要性，認為它是中國文學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書籍的出版旨在推動俗文學的研究，提高公眾對俗文學的認識。書籍設計精美，印刷清晰，是文學愛好者和研究者的必備參考。

關於俗文學之說

——致正尚學明先生

這是一篇關於俗文學的評論文章，作者為胡適。文章開頭提到「俗文學」這個名詞，並指出其在學術界和社會上的地位。作者認為，俗文學並非低級的文學，而是具有其獨特價值和生命力的文學形式。他追溯了俗文學的源頭，指出其與民間生活、民間藝術的緊密聯繫。文章進一步論述了俗文學在反映社會現實、傳承文化傳統方面的作用。作者呼籲社會各界正視俗文學的地位，給予其應有的尊重和支持。文章結尾強調，俗文學的研究不應僅限於學術圈，而應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以促進文學的多元發展和文化的繁榮昌盛。

序 一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俗文学学科建立和迅速发展的年代。由于郑振铎先生不断的提倡,特别是他的《中国俗文学史》出版(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的推动,在上海、香港、北京的重要媒体上,陆续创刊了6种“俗文学”研究周刊,它们是:

1. 阿英(钱杏邨)主编的《大晚报》(上海)《火炬通俗文学》周刊,民国二十五年(1936)4月3日创刊,同年12月30日停刊,共出刊40期。

2. 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香港)《俗文学》周刊,民国三十年(1941)1月4日创刊,同年12月6日停刊,共出刊43期。

3. 赵景深主编《神州日报》(上海)《俗文学》周刊,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7月5日创刊,出刊两期。

4. 赵景深主编《大晚报》(上海)《通俗文学》周刊,民国三十五年(1946)9月3日复刊,民国三十七年(1948)8月停刊,共出刊95期。

5. 赵景深主编《中央日报》(上海)《俗文学》周刊,民国三十五年(1946)10月11日创刊,民国三十八年(1949)1月12日停刊,共出刊92期。

6. 傅芸子、傅惜华共同主编《华北日报》(北平)《俗文学》周刊,民国三十六年(1947)7月4日创刊,民国三十七年(1948)

11月26日停刊,共出刊74期。

关家铨先生的新著《二十世纪〈俗文学〉周刊总目》(下文简称“总目”),就是为这些《俗文学》周刊发表论文的总目录。^①据“总目”所载,这些“周刊”总计共刊出文章八百余篇(“编目”序号866)。除了少量俗文学理论的探讨论文外,主要是中国古代小说(包括传奇、笔记、话本和章回小说等)、戏曲(宋金杂剧院本、元杂剧、南曲戏文、传奇,以及当代流行的地方戏,如梆子、“蹦蹦”等)、说唱(敦煌变文、诸宫调、散曲、宝卷、弹词、鼓词、大鼓、子弟书、说书、评话等)、小曲(俗曲、俚曲)、民间故事、歌谣、山歌、谚语等的研究论文,也有少量调查报告和民间故事、歌谣等作品。

在这些“俗文学”周刊发表文章的作者有(按姓氏笔画排序,括号内是作者发表文章用的笔名、本名):万曼、王玉章、王鸣高、王虹、王重民、王季思、王庆菽、方诗铭、叶德均(子振、德均、匀君、云君、永明等)、卢春、卢豫冬(旅冈)、冯沅君、阎万章、全祖援、庄一拂、关德栋、朱自清、孙楷第、孙师毅(施谊)、刘修业、刘思慧、刘聿功、刘敷荣(敷荣)、刘保绵、杜颖陶(绿依、清商)、杨荫深、杨拯民、李西溟、李德启、李若、李辰冬、李啸仓、严敦易、吴晓铃(嘿斋)、罗常培(罗莘田)、阿英(钱杏邨、魏如晦、李饶、李晦、吴均等)、何鹏、邹景衡、应天放、沈燮元、沈宝基、宋瑞楠、张长弓、(日)青木正儿、季羨林、陈寅恪、陈子展(于时夏)、陈汝衡、陈志良、陈禹越、邵曾祺、周作人、周一良、周贻白(云谷)、周煦良、金性尧(毛杆)、金祖同(且同)、邵曾祺、郑振

^① 另附赵景深先生为顾颉刚主编的《文史杂志》,第六卷第一期《俗文学专号》(重庆,民国三十七年[1948]3月1日出版)的目录。

铎(西谛、二西)、郑伯奇、郑骞(郑因百)、赵万里、赵景深(邹啸)、俞平伯(平伯)、柳存仁、恽楚材、钱南扬、顾仲彝、浦江清、容肇祖、徐士年、徐调孚、徐嘉瑞、凌景埏、黄芝冈、黄匀、曹伯韩(伯韩)、陆萼庭、童书业(童丕绳)、隋树森、傅芸子(芸子)、傅惜华(仲涵)、鲁迅(遗稿)、蔡莹、谭正璧、熊纬书、黎嘉、戴不凡、戴望舒(达士)等。^① 这些作者中,既有当时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精英,也有初涉研究的年轻学者。

如此众多的学者参与俗文学研究,说明学界对俗文学学科的认同和俗文学研究的吸引力。在中国文学艺术史和民间文学研究领域,俗文学研究形成一股新的潮流。在这种形势下,1946年底或1947年初,赵景深先生邀请在上海的热心俗文学研究的同好,组织了“中国俗文学研究会”,并计划出版“中国俗文学研究会丛书”。^②

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特别是从前苏联引进的以“阶级斗争”为理论基础的“劳动人民口头创作”说,成为界定中国民间文学范围和研究的金科玉律。郑振铎先生的《中国俗文学史》便遭到不断的批判。“俗文学”被认为是“市民文学”——反映地主阶级和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和充满封建糟粕的“文学”。三四十年的这些“俗文学”周刊,也被沉埋于故纸堆中。但是,尽管俗文学作为学科的研究被剥夺了话语权,但热心从事俗文学研究的学者仍然进行着各方面的具体研究。上个世纪50年代初(1951—1954)在上海以“中国戏

① 详见本书附录二:“论文著者笔画序号索引”。其中尚有众多因用笔名发表论文而难以考实的作者。

② 当时计划出版的“丛书”有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周贻白《中国戏剧史》。见本书前言及其注解⑮、⑯。

曲理论丛书”名义陆续出版的叶德均《宋元明讲唱文学》，孙楷第《也是园古今杂剧考》、《元曲家考略》和《傀儡戏考原》，阿英《雷峰塔传奇叙录》，傅惜华《曲艺论丛》，李啸仓《宋元伎艺杂考》等著作，可以说是上述“中国俗文学研究会丛书”的继续。1955年后，在上海陆续出版的傅惜华编《白蛇传集》、《西厢记说唱集》，路工编《孟姜女万里寻夫集》和《梁祝故事说唱集》，杜颖陶编《董永沉香合集》等（这套书所收作品，包括同题材的小曲、牌子曲、鼓词、弹词、子弟书、宝卷、小戏、明清传奇等体裁的作品，台湾的盗版书把它们称作“说唱文学丛书”）；1959—1962年由赵景深、关德栋先生校点整理出版的《明清民歌时调丛书》（包括[明]冯梦龙编《挂枝儿》、《山歌》、《夹竹桃》，清王廷绍编《霓裳续谱》、华广生编《白雪遗音》，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可视为在民间文学研究领域争取话语权的一次挑战。

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人文社会学界开始反思和总结 20 世纪学科的建设 and 研究。民间文学界把追随郑振铎先生进行俗文学研究的学者称作“俗文学学派”。我在 2003 年 10 月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

这些“俗文学”副刊以及相关学者的研究，为中国文学艺术史的组成部分：戏曲史、小说史的完善，和说唱艺术史的建立，组织了研究队伍，在材料的累积和理论研究的深入方面做出了贡献。在这些文学艺术形式中，作家文学、民间文学、通俗文学是密切交织在一起的，为了为它们争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研究者同郑振铎一样，没有在区分其中的“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上费工夫。因此，如果把这一批研究者称作“俗文学学派”的话，这个学派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学派，而不是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个学派；他们的

研究不是为建立一个民间文学学科,而是为了他们认为的“俗文学”取得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以表现出中国文学整个真实面目与进展的历史”(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序》)。^①

这是就“俗文学学派”研究的实践和成就而言。因为,从郑振铎先生二三十年代对俗文学推介和研究开始,到追随郑振铎先生研究俗文学的学者的研究,无不“以表现出中国文学整个真实面目与进展的历史”为职志。从三四十年代的这些《俗文学》周刊看,主编们虽然也注意到对当代俗文学(民间文学)进展的研究,但基本上仍以文献的研究为主,并且采取“人弃我取”的选择,以开拓中国文学艺术史研究的领域。这自然同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对“俗文学”的定义和“特质”的认定发生了矛盾。就个人愚见,郑振铎先生关于“俗文学就是民间文学”的论定没有错。可惜的是,50年代后俗文学学派在民间文学研究领域被剥夺了话语权,不可能再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现在总结上个世纪中国文学艺术史的研究,尽管在某些方面(如说唱艺术史)的研究仍然是薄弱的环节,但以古代诗文为“正统”的文学史观,早已被打破。从民间文学学科建设的角度检讨,突破“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束缚,也成为民间文学界的共识。所以,我在上述信中提出:

“俗文学学派”虽然在中国民间文学艺术史的研究方面颇多建树,却没有建立严整的民间文学学科,“民间文艺学”学派虽有系统的学科纲领,却将许多本属于民间文学

^① 此信经过删节,收在友人刘锡诚先生主持的《民间文学学术史百年回顾》笔谈中,见《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5期。

和民间文艺的作品排斥在学科研究的范围之外。以笔者愚见,新世纪的学者应当排除一些固有的成见和偏见,立足于中国民间文学艺术发展的实际,综合上个世纪各方面研究的成果,建立起中国民间文艺学的研究体系(学科),目的应当是为中国民间文学争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研究近现代以来民间文学新的发展。

借此重申上述认识,以求时贤的批评和讨论。

家铨先生来信说,关德栋先生(1920—2005)生前曾说过,“总目”出版时,一定要我写“序”。先生的嘱托,自当应命,但动手写来,百感交集。1979年我调到山东大学中文系,本师赵景深先生(1902—1984)即将我介绍给关先生,此后即在关先生领导下的民间文学教研室工作。尽管两年后我即奉命调到扬州师院中文系,为任二北(半塘)先生建立词曲研究室。但此后二十多年间,南来北往,每与先生做竟日谈,都得到许多教诲和鼓励。我奉先生如师,先生待我如友。记得90年代初期,先生提出让我整理这些《俗文学》周刊,我因耽于教学和其他研究,且两地来往不便,未能应命,而提出由在山东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家铨学弟来做这一工作。此后家铨即边学边干,以这些“俗文学”周刊为中心,陆续发表了现代俗文学研究史的论文近二十篇。如今又整理出这些《俗文学》周刊的“总目”,将久已不被学界所知的前辈们的研究成果,展示于世,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对于这些《俗文学》周刊的特点、在俗文学学科建设和发展中的意义,以及它们对学科发展仍然具备的文献价值,家铨在前言中作了详细的论述,毋庸赘言。从文献整理的角度来衡量,“总目”的编纂也是此类现代报刊文献整理的一个典范:“总目”正文是这些“俗文学”周刊上发表的“论文篇名音序编目”;为了

便于读者研究每一个“周刊”的特点,“附录一”为各个《俗文学》周刊的出版顺序目录;“附录二”是便于海内外读者检索利用“总目”的各种“索引”。其中的“论文著者笔画序号索引”,不仅附载每位作者的论文目录,同时考订、介绍了绝大部分作者(特别是使用笔名的作者)的生平事迹。在大陆学界,久已不见这样的文献整理著作了。家铨细致的整理工作值得称道,承担出版这部专著的齐鲁书社也会得到学界的称赞。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乱频仍。关德栋先生能够坚持十余年,搜集、保存这些在南北各地报纸上陆续刊出“周刊”,可以想见其难度。而此后数十年间,又悉心保护这批珍贵资料,使它们历经“劫火”保存下来。如果没有对俗文学研究坚定不移的追求和信心,不可能做到。如今,海内外已经难以寻觅到一份完整的六七十年前出版的这些“俗文学”周刊。希望家铨能再接再厉,继续整理,争取将它们影印出版。这是海内外关心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学者翘首以待的事。

车锡伦

2006年12月25日于扬州

序 二

在敦煌遗书中的“俗文学”材料被发现,特别是被纳入中国文学史的殿堂之前,传统文学理念中的中国文学只是由诗歌和散文构成的,戏曲、俗曲、小说、弹词等文学门类和体裁,一向是被排斥在外或没有地位的。换言之,俗文学之进入中国文学史,不仅扩大了文学的畛域,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史的体系架构。而且,由于俗文学与民间文学的难解难分的亲缘关系,俗文学的研究又成为 20 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一个重要流派。应当说,历史上的俗文学的发掘与进入文学史、俗文学研究的兴起与俗文学流派的形成,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和民间文艺学史上的一桩大事情。它的意义在于推动了中国文学史的一次巨变。

俗文学的被发现、被认识以及进而成为文学史的一部分,最重要的起因,是法国人伯希和和英国人斯坦因攫往西方国家的敦煌藏经洞的写本的公之于世。消息传来,我国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会主席张元济于 1911 年春赴巴黎和伦敦寻访,因受阻而未能取得相关材料。继而,伯希和将数十种达千张敦煌遗书的照片寄给北京的端方,由端方转交给罗振玉。同年 11 月,日本汉学家狩野直喜以调查伦敦、巴黎、彼得堡所藏敦煌遗书为由,作了一次欧洲之旅。在伦敦他抄录了秋胡故事、孝子董永故事,在巴黎他抄录了伍子胥故事。《艺文》杂志连续以《中国俗文学史

研究的材料》为题,发表了从欧洲发回的研究报告。他在报告中写道:“治中国俗文学而仅言元明清三代戏曲小说者甚多,然从敦煌文书的这些残本察看,可以断言,中国俗文学之萌芽,已显现于唐末五代,至宋而渐推广,至元更获一大发展。”(见中国国家图书馆汉学家库《狩野直喜·中国文学、戏曲研究》;严绍澍《狩野直喜和中国俗文学研究》,《学林漫录》第七集第142~1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狩野的这段话被史家认定为倡俗文学之论。狩野之后,胡适在作于1928年的《白话文学史·自序》里说:“敦煌石室的唐五代写本的俗文学,经罗振玉先生、王国维先生、伯希和先生、羽田亨博士、董康先生的整理,已经有许多篇可以供我们采用了。我前年(1926年)在巴黎、伦敦也收了一点俗文学的史料。”“日本方面也添了不少的中国俗文学的史料。”他还提到了《京本通俗小说》的出现,董康翻刻的杂剧与小说,元人曲子总集《太平乐府》与《阳春白雪》,郑振铎的《白雪遗音》以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对于俗文学史料发掘的贡献。

考察百年的学术史,俗文学在真正意义上进入中国文学史和俗文学研究形成体系进而成为一个重要研究流派,首功在郑振铎。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他由于参与抗议国民党屠杀革命者而被迫捕,不得不去欧洲避难。他在巴黎国家图书馆阅读了许多国内没有见到的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唱本等俗文学材料,写了《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并感叹说:“他们(指法国人——引者)是很早便注意到我们的小说与戏曲乃至弹词唱本了。我们自己呢,却至今还有人在怀疑我们的小说与戏曲的价值,至于弹词唱本则更无人提起了!我们是如何的轻视自己的宝物呢!”(郑振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